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研简报

2009 年第 6 期（总第 23 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09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要目

近来，我院邀请国内外学者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包括中国式民主 60 年及其走向、东亚共同体建设、台湾中华电信公司的民营化等，具体如下：

学术讲座

1. 中国式民主 60 年及其未来走向
2.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新动力与新使命
3. 效率还是不足：台湾中华电信公司的民营化

资讯

1. 杨玉良校长到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调研
2. 上海干部选学培训“公共管理核心能力”课程在复旦开班

● 学术讲座

中国式民主 60 年及其未来走向

10月27日，国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兴祖在3206教室作了题为《中国式民主60年及其未来走向》的学术讲座。浦兴祖教授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实地调研考察经历，以及接受听众提问阐述了他对中国式民主的内涵意义、发展历程及未来走向的理解。

一、60年起点：选定“中国式民主”

（一）选择民主 → 选择俄式民主 → 选择中国式民主

回顾历史，中国人探索民主经历了很长的道路：民国初期，搞过议会制、多党制，但当时一共冒出300多个政党，局面相当混乱；国民党在“混战”中胜出，但刚刚成功时，其领袖宋教仁被暗杀，对中国如何选择政治制度是很大的打击和考验；直至后来的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等，使人们对如何推行民主有许多困惑。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有这样一条：“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经过许多探索与实践，中国实行民主，不能搞西方模式，也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而应当具备民主的基本特征，同时必须考虑国情，形成中国式的人民民主。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有效推行民主，都必须顾及国情，实行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

（二）中国式民主的三大板块

中国式民主主要可以分为国家民主、社会民主、党内民主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是国家民主，即国家政权的民主，涉及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立法民主，人大民主。“行政”也讲民主，但更加强调效率；“司法”也讲民主，但更加强调公平。

第二板块是社会民主，指非国家政权的民主。就基层而言，主要是草根民主，如城市居民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等。就中高层而言，是政协民主，精英民主。政协民主并不等同于“协商民主”，但确实是以“协商”为主要方式的民主。

第三板块是党内民主，即执政党内部的民主。执政党反复强调要发展党内民

主，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一方面是以此加强党的建设，保障党的决策的民主性正确性，另一方面是以此示范效应带动人民民主。

二、60年历程：风雨曲折，艰辛前行

（一）1949—1956：确立与初显成效，我国的政治制度总体框架得以确立，民主的思想与实践体现于许多制度的制定与运行之中，民主发展可谓初有成效。

（二）1957—1977：变形与严重扭曲，自“反右”运动之后，原本的民主制度被束之高阁；“文革”期间，民主制度与民主实践均被严重扭曲，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制度，而是“最高领袖”、“最高权威”，法律也只成了“办事的参考”。

我们很难说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根本不要民主，但我们观察到：毛泽东觉得原先确立的那套民主制度不足以应对尖锐的阶级斗争，他要的是大字报、大辩论、“群众运动”这样的“大民主”。今天看来，文革期间的所谓“大民主”，无非是：高层，一人专断；基层，群众专政。

（三）1978—1988：恢复与启动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过去一个时期内，“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全会还重申了邓小平提出的重要观点：“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显然，民主并不只是讲多数，多数人的行为并不一定是民主，比如农民起义。民主还必须讲制度讲程序，民主是程序政治、有序政治。三中全会后，通过修改宪法法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从多方面恢复与发展了人大制度、选举制度、政协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实行党政职能分开，才能有利于发展民主，也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准备逐步推开。

（四）1989—2009：震荡与缓步推进，1989年的国内政治风波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使中国民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遭受了剧烈的震荡。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政策下，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放缓求稳。

三、当今情势：比以往更需要民主

（一）发展民主的主要动因

1. 市场经济需要并推动社会利益的分化：利益分化推动利益诉求与政治参与；人民大众不仅是物质与文化的需要在日益增长，而且是政治参与的需要也在日益增长。古希腊先哲说“需要是人类的导师”，其实，还可以说“需要是文明

背后的动力”。物质、文化与政治（参与）三大“需要”呼唤着三个“文明”建设。如果政治文明、民主制度供给滞后，利益诉求、政治参与便有可能演化为“街头政治”，引发不稳定因素。用亨廷顿的公式表示：社会部稳定 = 政治参与 / 政治制度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正是为了推进民主发展，逐步供给足够、顺畅的民主制度管道，以此适应“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之需。

2. 权威转型：中国经济体制在转型，政治权威也在经历着转型。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三种权威模式；显然，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魅力型权威，而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则开始转向法理型权威，主要是由社会历史因素决定，而法理型权威必然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民主、法制，充分发挥民主制度的功能。

3. 权力腐败：权力腐败现象并非只是个案，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关注。党和政府一直在寻找对策，从“三讲”到“三个代表”，从“法治”到“德治”，从“先进性教育”到“科学发展观”。但是，要真正找到很有效的对策并非易事，我们的反腐倡廉仍然面临着复杂的严峻的挑战。权力腐败的问题使人联想起那个“历史周期律”。毛泽东早就指出过，“只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依靠“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这就是告诫我们，应对权力腐败，必须发展民主。

4. 世界潮流：孙中山就意识到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走向民主，走向共和早已成为了世界潮流。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也指出了“世界民主发展潮流”的问题，他说，“人民政协……既顺应世界民主发展潮流，又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在世界民主潮流面前，我们必须切实推进我国民主的发展，必须“当真”“用足”现有人大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政协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制度空间，获取实实在在的制度绩效。同时，注意借鉴包括西方民主在内的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使之为我所用。若能如此，中国必定“顺之者昌”。各项动因昭示，当今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主，发展民主也是“硬道理”。

（二）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

1. 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当今世界，人们普遍认可“民主”这一价值取向，至少在相对意义上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有些人并不如此，掌权者从其本

性、本能出发，必定不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民主强调权力属于人民、权力不能过于集中、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强调权力可以委托也可以被人民收回，掌权者便不能为所欲为。于是，他们只能在嘴上讲民主，在实际上对民主产生抵触，他们就会成为民主发展的障碍。当然，掌权者如果超越本性、本能，从世界发展潮流、从人民利益出发，那么就会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会引领民主发展。

2. 民主疑虑：有些人赞成民主，但对民主发展又多存疑虑。比如，民主会导致“西化”吗？民主会影响党的领导吗？民主会超越国情吗？民主会引起不稳定吗？本人在地方调研时发现，有些干部出于疑虑而怀有这样一种心态：“民主不搞不行，真搞更不行”。那么，隐含的结论便是“假搞”，形式化地搞。比如，法律规定差额选举，不搞不行，那就搞“陪衬式差额”、“象征性选举”。这是让民主遭遇了尴尬和窘境。我们知道，民主需要一定的形式（包括特定的规则、程序等），能够反映内容与实质的形式，是必要的形式；不能反映内容与实质的形式，就是“形式主义”、“形式化”。

（三）关于民主发展的重点之争

当今中国，民主发展的重点是什么？早先有人提出是草根民主，后来有人主张是党内民主，近年有人力挺协商民主（政协民主）。从发展战略上看，本人一直坚持人大民主是中国民主发展的重点，与“草根民主是基础”、“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票决与协商两种民主形式”并不矛盾：每个方面的民主都十分重要，它们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比较的角度而言，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的发展程度，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国家民主、政权民主，在我国，首要的是人大民主。

四、未来走向：两种可能

中国式民主的未来走向如何？有两种可能摆在我们面前：坚持与转向。何者将成为未来的现实，并非个人意愿可以决定，只有社会历史条件才能给出最后的答案。转向社会历史条件是具体的。现在可以大致预见：经济基础会否发生根本性变化，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能否有效巩固，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会否对中国民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现今民主制度的绩效能否始终获得13亿人民的认同。我们希望“坚持”，因此我们倍加关注诸多社会历史条件的变量。我们殷切期盼，在党、政府、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式民主“明天会更好”。（凌云志 供稿）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新动力与新使命

11月12日，国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郭定平在3108教室作了题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新动力与新使命》的学术讲座。郭定平教授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提出与基本构想”、“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与基本成就”、“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问题与基本原因”、“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动力与基本方向”等四方面阐述了他对东亚一体化的理解与认识。

一、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提出和基本构想

第一阶段：酝酿阶段（1995-2000）

1995年，东盟在曼谷首脑会议上提出举行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晤的设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东亚各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但也激发了各国推进地区合作的强烈愿望。同年底，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聚首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0+3”（时为“9+3”，1999年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成为“10+3”）合作机制正式启动；1998年，第二次“10+3”领导人会议根据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倡议，决定成立由东亚13个国家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研究东亚合作的中长期规划；2000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东亚峰会概念。同年，新加坡在“10+3”会议上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

第二阶段：提出概念（2001-2002）

2001年，由参加“10+3”会议的东亚13国26位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交《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研究报告，提出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报告指出，经济合作是走向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应首先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

第三阶段：（2003-今）

2003年，东盟宣布在2020年建立“东盟共同体”，它有三个支柱：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同年年底，日本和东盟举行特别首脑会议，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也确认了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一目标；2005年，东盟在首届东亚峰会上发表《吉隆坡宣言》，宣布提前5年，即在2015年率先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会议各方就有关东亚一体化进行了相关讨论，但中日两国在会议共同宣言的起草上就出现了较大分歧：中国认为讨论建立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场合应该是“10+3”会议，但日本主张应该是包括“10+3”成员以及印度、澳

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东亚首脑会议；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各方关注到了建立东亚合作机制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的必要性，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再次被提上日程；2009年10月25日，第四届东亚峰会在泰国华欣举行，各国领导人就推动东亚合作交换了意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原则，并将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各国合作发展的长远目标。

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和基本成就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巨大损失，现实变得空前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救援过程中提出了很多苛刻条件，在东亚引起强烈反弹，东亚各国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力量感到失望，激发了东亚内部团结自救的想法。1997年底，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聚首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0+3”（时为“9+3”，1999年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成为“10+3”）合作机制正式启动。

进入新世纪后，东亚共同体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合作层次而言，多层次合作稳步推进，东亚各国从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多边合作发展到小区域合作（如：大湄公河区域合作等）、次区域合作（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直至全区域合作（10+3）。

合作进程中，多样化与多渠道并行，从第一轨道（东亚国家领导人会议到各执行部门）的合作，到第二轨道（半官方和民间的组织与机制）的交往，再到第三轨道（东亚论坛、东亚思想库网络）的互动，一个全面的合作机制正在形成。

三、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问题和基本原因

“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几十年来发展进程曲折而缓慢，当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在许多方面都还存在非常多的争议，而各国间的分歧也十分明显。

首先，在对“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这一基础性问题上，包括东亚各国就没有能够达成共识。中、日、韩、东盟等，各方都有自己的一套对东亚共同体的解释，这些基于本国利益的不同主张之间包含很多冲突矛盾之处，对他国的预期与他国的实际主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落差，很难达致共识。

其次，各东亚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阻碍。东亚各国不但在文化、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冲突纷争不断，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缺少足够建立共同体的认同

度；东亚地区也存在着安全隐患，因为缺乏稳定的制度化的机制来应对安全问题，这也是东亚地区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的困境。

再者，除了内部矛盾外，东亚各国还必须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其中第一障碍就是美国，美国对于东亚的影响力毋庸置疑，而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对于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很少持支持态度，对于建立不包含美国在内的东亚合作机制更是明确反对。因此，如何应对东亚体系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压力，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也是重大问题。

总体而言，东亚地区差异大，发展水平不一，中日韩三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够稳定，东亚共同体建设仍面临许多挑战。如何协调多样化与共同体的联系、如何建立坚实的经济基础以整合成员国之间分散的经济、如何协调东盟与中日韩三个主要大国的关系，将是东亚各国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四、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动力和基本方向

对于区域性的合作机制来说，已经有东盟和欧盟这两个较为成功的范例，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这种类似的合作机制的可行性。同欧盟或东盟各国一样，东亚各国之间不仅地理位置相近，历史文化背景中存在相似性，且各国经济贸易交流日益活跃，双边及多边的经贸合作机制正不断完善和发展。现今，中国已经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同意在 2010 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日本、韩国也分别与东盟签订了 FTA。这无疑将为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增加更多更大动力。

东亚地区正在形成新的经济分工，区域内贸易不断壮大，经济联系逐渐加强，为东亚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东亚区域内部的多种合作机制也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通过交流与沟通，共识日益增多，地区认同日益增加。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促使东亚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在反映东亚地区的声音的同时谋求与其他地区的平衡发展。对于中国而言，我国的迅速发展和大国崛起为东亚共同体建设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中国在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必然承担更大的责任。

东亚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已被金融危机等诸多事件所证实，建立东亚共同体这样一个东亚合作机制的目标也为各国所认同。随着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融合，东亚一体化进程将继续稳步迈进。（郭定平 供稿）

效率还是不足：台湾中华电信公司的民营化

12月25日，台湾交通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王俊元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615会议室作了题为《效率还是不足：台湾中华电信公司的民营化》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公共行政系副教授、国务学院院长助理敬义嘉主持。

王俊元首先在宏观方面讨论了民营化的政治哲学，指出民营化的政治哲学是偏右的，是新右派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梳理了新右派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然后，王教授简单介绍了台湾民营化的类型、时间进程、研究议题。他认为，台湾民营化存在所有权转移、经营权利形态转变和市场开放三种类型。

在研究议题方面，王俊元重点介绍了民营化中四个争议议题，包括民营化是否促进效率，民营化是否提高组织竞争力，民营化是否孕育腐败以及民营化是否忽视公共利益。王教授具体分析了中华电信的民营化过程的三个阶段，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衡量了中国电信的民营化绩效，就中华电信的民营化做出了四点总结思考：一、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指导的民营化才能促进效率；二、在一定的企业文化和氛围下，民营化能够促进企业竞争力；三、民营化中的责任缺失导致腐败；四、政府对变化了的角色的无知导致对民营化中公共利益的忽视。(敬义嘉 供稿)

● 资讯

杨玉良校长到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调研

12月23日，杨玉良校长来到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开展调研，就学科建设、学生培养以及学校发展与管理体制等问题与学院党政领导和部分教师代表举行座谈。国务学院分党委书记沈兰芳、常务副院长林尚立以及教师代表邱柏生、邓正来、樊勇明、徐以骅、陈明明、吴心伯、陈志敏等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林尚立副院长首先介绍了学院学科建设的历史脉络与当前的基本情况，学院的学科建设主要通过研究成果、学科平台和学术精神三个方面来抓，学院将着力从学风建设、机制建设、学术体系、学术前沿等四个方面来建设学科形态，打造学科之形与学术之魂。

各位座谈教师分别从学生培养、通识教育、科研管理、课程设计、研究生论

文发表等多个方面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并对学校的发展建言献策；杨玉良校长对各位老师提到的问题详细地予以反馈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作为一所大学，学科建设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工作；复旦的教育要面向未来，思考 15、20 年之后的中国发展，肩负促进世界和平的作用，承担大国的角色。大学要面向未来，就需要回归大学本身，考虑其本来的功能。我们要坚守学术的精神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让复旦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抵制世风流俗的影响。（赵信敏 供稿）

上海干部选学培训“公共管理核心能力”课程在复旦开班

12 月 26 日，上海市干部选学培训“公共管理核心能力”课程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袁天凡报告厅正式开班。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小林教授出席开班仪式，并代表学校致欢迎词。国务学院倪世雄教授、法学院潘伟杰教授作了开班第一天的两场讲座。

上海市干部选学培训是上海市委组织部为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而推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一种创新形式。本次培训面向的主要对象是上海市市管干部和后备干部，承担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主要是复旦大学等 8 所在沪高校和上海市科协。

复旦大学党委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党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国务学院承担了“公共管理核心能力”专题培训，对教学培训课程和内容等进行了精心设计，针对干部选学的需求，共安排了“大国崛起的外交战略”、“行政的法律风险及其规避策略”、“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智慧”、“公共政策的民主过程”、“文化积累与领导境界”、“公共关系与危机处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技术”等 8 场讲座，并聘请林尚立等专家分别主讲。

上海市委组织部将选学培训专题、课程和培训机构公布在“上海干部在线学习城”网站，由培训对象自主选择参加培训的专题和机构。复旦大学“公共管理核心能力”专题受到广大干部的青睐，报名参加培训的干部达到 285 人，为本次选学参训人数最多的班次。（谢余凤 供稿）

编辑：张超施莹

审核：陈玉刚